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海外汉学研究

——汉学在 20 世纪东西方各国
研究和发展的历史

刘正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刘 正 北京市人,1963年生。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后研究员,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中国思想史专业)。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其中,所发论文曾荣获中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马来西亚第11届国际易学大会优秀论文等。迄今为止,已在国内外出版《周易通说》、《中国易学》、《周易发生学》、《西藏密教》、《东西方汉学发展史》、《金文氏族研究》等学术专著十余部。研究方向为金文和殷周史、中国思想史、东西方汉学史。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目 录

余英时先生原序	1
序 论	5
第一章 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语言学为中心	21
引 言	21
第一节 汉语研究	21
一、汉语通论	22
二、汉语语法学的研究	24
三、汉语方言学的研究	31
四、汉语音韵学的研究	33
五、高本汉的中古音理论	35
六、汉语教材的出版	37
第二节 汉语辞典的出版	38
一、中外文辞典	38
二、专业用语辞典	44
三、百科辞典	51
第三节 古籍索引著作的出版	51
第二章 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文字学为中心	59
引 言	59
第一节 甲骨文字学研究	59
一、明义士的甲骨学研究	61

二、林泰辅的甲骨学研究	63
三、白川静的甲骨学研究	64
四、其他	66
第二节 金文学的研究	68
一、高本汉的青铜器研究	69
二、安特生的青铜器研究	70
三、其他	71
第三节 《说文》学研究	73
一、东西方汉学界的《说文》学研究	73
二、白川静和《说文新义》	73
第四节 文字学通论	74

第三章 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历史学为中心（上）

.....	77
引 言	77
第一节 通史研究	78
一、20 世纪前期	78
二、福兰阁和《中国通史》	81
三、20 世纪中期	87
四、最近二十年	89
五、欧美汉学界和《剑桥中国史》	91
第二节 东洋史学的成立和展开	93
一、东洋史学的概念	94
二、东洋史学的成立过程	95
第三节 中国研究的成立和展开	99
一、早期美国汉学界的中国史研究	99
二、费正清的清史研究	100
三、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	103
四、其他	105

第四节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108
一、日本汉学界·····	109
二、欧美汉学界·····	109
三、其他·····	111
第五节 地域史研究·····	111
一、日本汉学界·····	111
二、欧美汉学界·····	112
三、其他·····	113
第四章 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历史学为中心（下） ·····	116
引 言·····	116
第一节 正史著作研究·····	116
一、《史记》研究·····	116
二、《汉书》研究·····	117
三、其他·····	118
第二节 史学著作研究·····	119
一、沙畹和《史记概说》·····	119
二、内藤湖南和《支那史学史》·····	119
三、其他·····	120
第三节 专题研究·····	122
一、人物研究·····	122
二、文化史研究·····	126
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129
第四节 断代史研究·····	130
一、殷周史研究·····	130
二、秦汉史研究·····	134
三、三国史研究·····	137
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137

五、隋唐史研究	138
六、宋史研究和“宋代研究计划”	141
七、元蒙史研究	147
八、明史研究	149
九、清史研究	152
第五章 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宗教学为中心	160
引 言	160
第一节 中国宗教史研究	160
一、杜瑞和《中国的迷信和宗教信仰》	160
二、其他	161
第二节 中国宗教学通论	162
第三节 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研究	164
一、葛兰言的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研究	164
二、原始宗教信仰研究	168
三、韦伯和《儒教和道教》	169
四、其他	170
第四节 道教信仰研究	171
一、通论研究	172
二、道教经典研究	173
三、道教史研究	176
四、道教内外丹学研究	180
第六章 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思想史为中心	185
引 言	185
第一节 中国思想通史研究	186
一、20 世纪前期	186
二、佛尔克和《中国哲学史》	191
三、20 世纪中期	192

四、最近二十年	195
第二节 儒家经学思想研究	197
一、经学史研究	197
二、经学思想研究	201
第三节 专题研究	207
一、先秦思想史研究	207
二、两汉思想史研究	219
三、魏晋思想史研究	223
四、宋代思想史研究	225
五、明代思想史研究	230
六、清代思想史研究	233
七、其他	236
结 论 汉学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237
一、汉学史研究论著的种类	238
二、汉学史观和工具理性的问题	245
参考书目	247
后 记	254

余英时先生原序

序

什么是“汉学”？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认真地分析它，我们至少必须写一部专书。“汉学”的西文原字是“Sinology”。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探讨。这样看来，我们用汉语中“汉学”一词来翻译“Sinology”不但取义过狭，而且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汉族中心论”的偏见。从字面上说，“Sinology”应该相当于中国人所谓“国学”的范围，但事实上，“国学”一词最初借自日本，在近代中国又另有演变，仍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无间。日本学者曾用“支那学”译“Sinology”，在语源上最为忠实。“支那”这个梵文古字的初义似乎有褒无贬。然而，“支那”和“支那人”在某些近代日本人的使用中又添上了一层特别的涵义。因此，“支那学”也不是现代中国人所愿意接受的。

语言的特质之一是“约定俗成”，中国自《荀子·正名》篇起，西方从柏拉图 *Cratylus* 篇起，早已揭出此义。所以我们不妨承认“汉学”即是“Sinology”的译语，不必再细加辨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却是我们无法完全回避的：中国以外的“汉学”和中国学人在同一领域中所发表的汉文论著究竟是属于同类的呢，还是异质的呢？据我几十年来的体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多数中国学人，主要由于语文的隔阂，往往不免以异样的眼

光看待所谓“汉学”的著作。有些先辈中国学者总觉得中国经典博大精深，文字古奥曲折，决不是外国人所通晓的。在他们看来，外国人出于好奇心而研治中国学问，大概像张骞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的要领。章炳麟便曾流露出这一倾向，虽然他评论孔子、儒学仍不免受到远藤隆吉、白河次郎等人的影响。这一心态在当年自不是全无根据，但也未可过甚其词。王国维与日本林浩卿博士往复讨论《洛诰》中“裸”字之义，即可见一斑。如果说日本早有中国经史研究的传统，因此才能产生少数杰出的人物，那么我还应该想到欧洲许多第一流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和瑞典的高本汉、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等。尤其是伯希和与高本汉两位，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学”的发展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把“汉学”看作“化外”的边缘事物，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应该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中国第一流学人如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便曾严肃地讨论过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汉学”的中心当时是在巴黎呢，还是在日本京都呢？什么时候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呢？这个问题似乎在今天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如果说，在19世纪中国人的学问依然自成系统，与域外的“汉学”截然异趣，那么在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已完全改变了。而且即使是在19世纪，英人利雅格（James Legge）得王韬之助，将儒家主要经典译注成英文，便是世界汉学史上的一件大事。1875年陈其元从香港的《华字日报》上看到这条新闻，大为兴奋。他因利雅格竟能“研究马、郑、程、朱之学，用夏变夷”，便毫不迟疑地称他为“豪杰之士”。可见“汉学”即在彼时也未能一律视为“化外”。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原有经、史、子、集四部系统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从此，中国的“国学”和域外的“汉学”在实质上更难分疆划界，惟一可实指的差

异只剩下发表论著时所使用的语文了。近几十年来就我阅读所及的范围而言，当时竟不免发生一个非常奇异的感觉，即有些中国学人以汉文写成的“国学”著作好像是十足的“汉学”成品，而有些外国人以“非汉语”发表的“汉学”成果反而体现了中国“国学”的风格。这就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反思了。

20世纪下半叶，主要由于美国所投注的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汉学”发展的重心已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更由于涵盖面的年限扩大和时代性的包罗古今，美国学人嫌“汉学”之名过于陈旧，主张用“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来代替它。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汉学”这个名词的本身曾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体上说，今天美国学人已很少用“Sinology”这个字了。即使在欧洲，“中国研究”也已有取代“汉学”的迹象。

名词之争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1930年陈寅恪先生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曾提出“预流”与“未入流”之说。他认定“敦煌学”是当时“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人必须急起直追。今天的“新潮流”则已扩大到中国研究的每一角落，不能再以“敦煌学”为限。域外的“汉学”已取代了当年“敦煌学”的位置。所以中国学者即使研究自己的“国学”也有“预流”或“未入流”的问题。以我稍有所知的中国史学而言，倘在选定专题研究之前不查清汉学界有关该题目的主要文献，我是不敢贸然决定的。万一在研究工作完成以后发现别人已先我为之，并且比我做得更好，那么我的时间和努力岂不完全浪费了？

我很高兴看到今天中国本土的学人已开始注意到域外“汉

学”的相关性，虽然这一相关性目前还未能能在学术论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改变中国学人长期以来对于域外“汉学”的先入之见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办得到的，但有系统地撰述汉学史不失为一个最有效的始点。这一新风气最近似乎已在中国大陆上掀起了，这是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今年我所收到的作者赠本便有张国刚先生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和张静河先生的《瑞典汉学史》两种，都是作者亲自在德国和瑞典深入考察访问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专著。这两部书都翔实可信，贡献不小。

旅日多年的静源（刘正）先生，英年好学，研究的规模尤为宏大。他最近发奋写成了一部包罗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史。这样一部通论性质的基础研究史，更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所迫切需要的。我虽然还没有机会读到全稿，但从目录中看见他将汉学研究分系在“儒家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两大系统之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解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我希望静源（刘正）先生此书出版后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回响。故略道平素所感，以当介绍。是为序。

余英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一九九七年

序 论

20 世纪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有个重大变化，就是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超过了以往的对古代中国的诸多研究。这一变化的明显标志就是“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走红国际汉学界。

在 20 世纪以前的东方各国，汉学的发展是和儒学、汉文学、支那学等术语及其相关的研究著作、学派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史紧密相关的。

首先说儒学。它在英语中一般称为“Confucianism”（或“Confucianist”儒学者，它的本义又和占星术者有渊源关系）。在 20 世纪以前的东西方汉学发展史中，儒学并不是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定说明。中国儒学之外，朝鲜儒学（如退溪学）、日本儒学（如朱子学、阳明学）等等也是儒学史的研究范围之一。但是，儒学在古代东亚社会里，特别是在古代日本和朝鲜，作为汉学的一种指代，则是指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专门研究之学。朝鲜儒学（如退溪学）、日本儒学（如朱子学、阳明学）等等则属于朝鲜思想史、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汉学史研究只需参考其部分资料，不必顾及其全体。具体地来说有所谓“支那儒学”的概念，实是日本学术传统中所谓“支那思想史专题研究”的简称。在中国学术界，对儒家、儒学、儒教的具体定义和使用区分至今仍时有异论出现，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核心基础，“儒学”的概念为国际汉学界所通用。其主要内容是以传统的十三经为核心，以历代思想家们的经学著作作为其辅助

而展开的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汉学史意义上的儒学。在古代的东亚社会里，儒学确实曾是汉学的特殊名称。在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接受儒学和研究、解释儒学是了解汉学的一个途径，并且由此又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了解。直到今天，在亚洲，在欧洲，在美洲，儒学仍然被看作是汉学的核心组成。与儒学有关的训诂学、文字学、汉清朴学、宋明理学等等仍然是汉学研究的重要代表。

其次再说汉文学。这一概念也是在日本学术界曾被使用过的学科名称。时间约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后期到大正时代之间。在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就设有汉文学科。当时有所谓“汉文学会”的学术组织和《汉文学会报》的杂志，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文、哲经典著作的研究。1949年以后，进行这一研究的组织是日本中国学会。在日本汉学界传统中，一直把对日本汉学史的研究称为汉文学史。对汉文学可以有以下几种理解：①汉文学即研究以汉文写成之著作之学。如1877年至1889年的东京大学据此设汉文学科。②汉文学即汉学。如1889年东京大学就把汉文学科改名为汉学科。

最后说所谓支那学。“支那”一词在古籍中有种种不同写法，以我之所见共八种，如下：支那、至那、脂那、摩诃支那、莫诃至那、震旦、振旦、真旦。这一概念最初来自梵语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词。其本意是“秦”，它是古代印度用来指代中国古代秦王朝的专门术语。在古代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一书中已有“支那”一词。这就是今天英语中“China”一词的直接来源。在西方汉学史上，德国汉学家李施霍芬博士(Ferdinand Richthofen)曾主张“China”一词来源于今天的越南地区。此说也许有点根据吧。因为秦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之时，曾有不少中原人避难来到当时的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地区。英国汉学家拉考派瑞博士(Terrien de Lacouperie)以为

“China”一词起源于今天的云南地区。但他是以上古时代云南与印度贸易来往的历史角度来定论的。如能成立的话，也只说明印度的“Ch'in”即是由云南传入的“秦”。法国汉学家考狄博士(Cordier Henri)甚至认为《旧约全书·伊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的“Sinim”就是指“Sin”、“Sinai”，即指中国。此说的成立没有充分的汉文史料的证据，只说明了比较语源学上的一个可能性问题。

日本汉学家岩村忍博士在《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一书中考证说：

但是，有关“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 ts'in（通俗的 chin）而来的。这一音中的 ch 的发音是由不发 ch 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 Shin、Thin 的发音，更进而形成了 Sinae、Thinae 的发音。^①

在古代语言世界里，“支那”一词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nai”等读法。日本汉学家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一书中以为：

“支那”的语源分为两支，一支是由陆路传来，读音为 Seres 或 Serike。一支是由海路传来，读音为 Sin、Sinai、Thin、Thinai。^②

① 岩村忍：《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三省堂，昭和十四年。

② 青木富太郎：《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萤雪书院，昭和十五年。

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博士在《欧洲的中国研究》（《欧人の支那研究》）一书中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这一考证是可信的。本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把东西方汉学发展史按地理位置分成环中国海诸国（所谓“一支是由海路传来”）、丝绸之路诸国（所谓“一支是由陆路传来”）和新大陆诸国（和“一支是由海路传来”的相同）三个汉学文化区的。因为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支那”和“丝绸”的含义紧密相关，并一度成为“丝绸”的代称。希腊语中的“Serices”、“Seres”和拉丁语中的“Sen”、“Sinai”，以及“Serikon”或“Sericum”的概念，都和“Serindia”之名有关。从语源学的角度上来说，“Serices”、“Seres”、“Sinai”、“Sinae”、“Serikon”、“Sericum”、“Serindia”、“Sen”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词干“ser”。而“Serindia”一词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如在著名的《地理学》（*Geographice Hyphegesis*）一书中，指位于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之间的地带。这一地带即所谓的“西域”和“中亚地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这一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来华和去欧的中西交通必经之路，进而也是汉学和西方各国、中亚各国进行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个窗口。20世纪初的汉学家们的中亚考古、敦煌学的兴起等等，都与此有关。

最初，在日本汉学界出现的是“支那哲学”而非“支那学”。1881年9月，东京大学正式设立了“印度及支那哲学”的教学科目。1907年，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狩野直喜博士、高濂武次郎博士为首成立了“支那学社”，1920年开始又发行了《支那学》刊物。日本汉学家三浦国雄博士在《中国研究：这五十年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研究この五十年·哲学·思想》）一文中曾指出：

称呼为“支那学”则是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以清代考证学

为主，力图确立中国哲学研究的近代化的立场。^①

因此，支那学的出现和京都学派有直接的联系。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它反映了京都学派的汉学家们以清代考证为核心，使传统汉学走向近代化的一种努力。而京都学派的汉学家们上述倾向的由来也许可以上溯到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一任教授狩野直喜博士的老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岛田重礼博士那里。见《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一书中的记载：

岛田重礼……开启了把经学研究向新兴的支那学研究的转向，在他的门下出了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两大家……可以说岛田重礼是现代日本汉学界新兴的支那学研究之父。^②

在支那学社成立之前，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曾先后成立了“东亚学术研究会”和“经学研究会”，以后又合并为“斯文会”，并发行了《汉学》、《斯文》、《东亚研究》等刊物。到支那学社和《支那学》刊物出现为止，以支那学来指代汉学、中国学的现象正式形成。1945年以后，日本政府明文规定停止使用以“支那”称呼中国、以“支那学”称呼汉学和中国学。

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各国，汉学的发展又是和东洋学、东方学、汉学、华学等术语及其相关的研究著作、学派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史紧密相关的。

首先说东洋学、东方学。东方学“Orientalogy”这一概念是从地理位置的东方而来的学科名称，概指一切和东方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有关的学问。这也是一种泛指，和上述中国学、印度学、

^① 三浦国雄：《中国研究この五十年·哲学·思想》，见《日本中国学会五十年史》，汲古书院，平成十年。

^② 《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国际出版印刷社，昭和十七年。

日本学、美国学的得名一样，但这一概念得名于西方世界，是指相对西方来说的、从地理上的东方而形成的、研究东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学科。在拉丁语中，“东方”一词是“Oriens”，和英语中的“东方”一词“Orient”都有共同的词干“orien”。而这一词根的意义有表示方向性的含义：作为动词使用时可解作“定位”、“定向”；作为名词使用时可解作“日出”、“升起”，并由此又可以作为动词意义的“日出”、“升起来”使用。在日语中，“东”字又有起源、本源意义在内。这和《周易》哲学中的“帝出乎震。震者，东方之卦也”的方位观又是一致的。在西方国家，东方学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可以包含对古代近东国家、东方基督教国家、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古代中亚国家、古代印度、东南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东方学以对中国、印度、南亚和中亚诸国之文化和文明的研究为主，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东方学家麦格威瑞博士（W. M. McGovern）在《中亚早期帝国研究》（《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一书中说：

从本世纪开始，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代东方国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存在。^①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把研究东方学的学术组织称作“东方学会”。其中，比较著名的“东方学会”的成立时间、具体名称和主办国如下：1778年，荷兰东方学会成立，正式名称为：Batavien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1822年，法国东方学会成立，正式名称为：France Asiatic Society。1824年，

^① 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此书具体出版时间及出版社不详。